

# 暨南園,我生命之舟的港灣

作者：張 穗 強



1957年暨南大學在廣州石牌重新建校並舉行開學典禮。

暨南大學位于廣州東郊的石牌地區，是一所歷史悠久，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的華僑大學，該校自1957年在廣州重新建校后，因父母一直在暨大任教，我的童年、青年、中年都在校園度過，暨南大學成為我的第一故鄉，與我結下不解之緣。半個多世紀來，伴隨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，暨南園與華夏脈搏一起激蕩，我的人生也隨之風雨不斷，歷盡滄桑，度過一段段難忘歲月，留下一個個難忘故事。今天，不惑之年的我經常從香港回到暨大居所，探親度假之余總愛在校園流連往返，回眸往事，感慨人生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，暨南園，你帶給我多少歡樂喜悅，多少憂郁哀傷，你是我生命的搖籃，是我一生最難忘的地方。



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擔任暨南大學首任校長。

暨南大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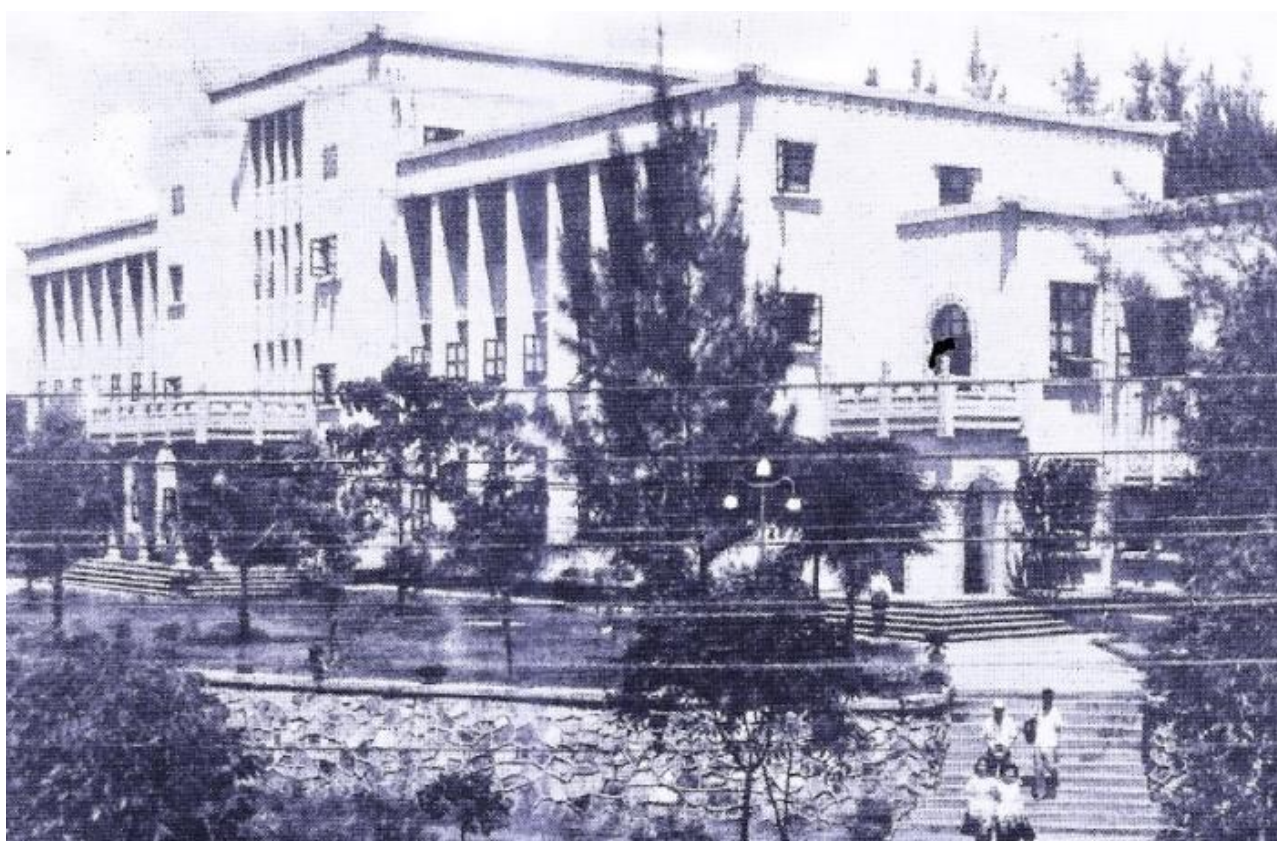
建校初期陶鑄校長題寫的暨大校名

### 參加建湖勞動 留下歲月追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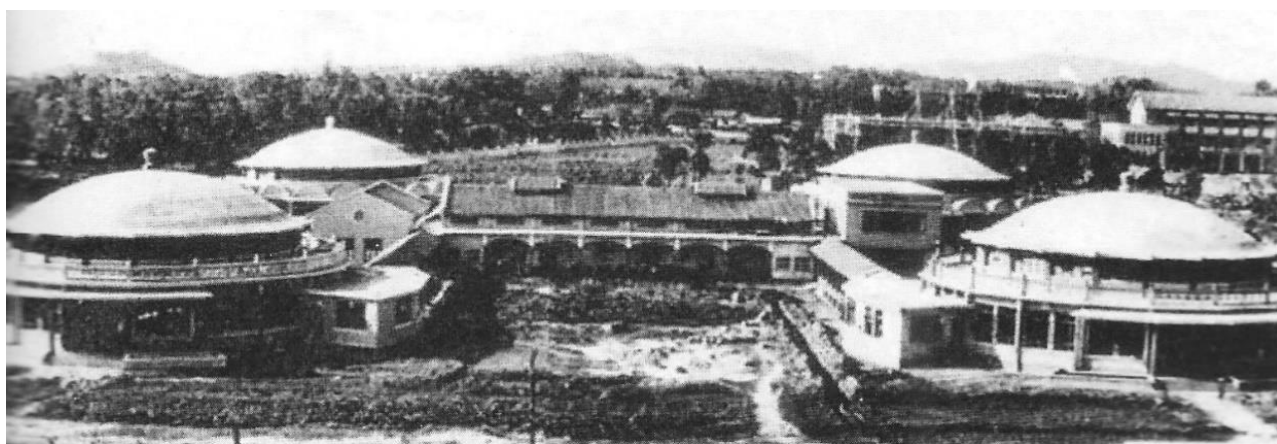
暨南大學在廣州復辦后不久，父母雙雙調入經濟系任教，舉家入住暨大教師宿舍，我入讀暨南大學附屬小學，開始了漫長的校園生活。那時正值國內經濟困難，大學各方面條件還很差，大學教師的生活水平很低，我和附小同學雖生活在校園，但都經歷過課餘種植、養殖，“赤腳走在田埂上”的童年生活。1959年，暨大決定在中區挖塘造湖，一來改觀校園面貌，二來養魚改善生活，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參加義務勞動。那時身兼暨大校長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，親率校、系、處室各級領導幹部參加挖湖勞動，我和暨大附小同學也在老師帶領下參加過幾次，記得一次還在工地上與母親帶領的暨大經濟系學生相遇，母親再三叮囑我勞動時要注意安全。那場不分領導群眾，不分教師學生，不分大人小孩的暨大建湖大會戰，在我幼小心靈中留下深刻記憶。



筆者（後排左3）作為暨大附小學生參加過建湖勞動



暨南大學早年的行政辦公大樓。



早年暨南大學由四個學生食堂組成的“蒙古包”

建湖工程完成后，以校園中區主干道分隔成“日湖”、“月湖”兩大湖塊，合稱“明湖”。挖出來的塘泥堆積成湖心島，島上建造了古色涼亭，又建小橋與湖岸相連，湖水古亭輝映，湖岸

楊柳低垂，湖面小艇游弋，“明湖”成為暨大校園一道亮麗的風景線，更是師生家屬及校外人士常來遊覽觀賞之地。當時暨南大學設有水產系，“明湖”還成為該系的水產科研基地，經常捕撈大批鮮魚活蝦運送各大食堂加菜，成為校園的又一盛事。如今退休後我每次回到暨大小住，都要刻意來“明湖”岸邊漫步，湖畔靜坐，望亭觀柳，尋找足跡，思緒萬千。那時人與人之間關係那樣的淳樸，干群關係、師生關係、家庭關係時那樣的可愛，憶昔思今，唏噓之情每每泛起，難以散去。

### 惶恐文革歲月 難忘千校探親

1962年我小學畢業，同年考入華南師院附中。該校與暨南大學校門相對，近在咫尺，多年來我都沒在附中住校，每日朝離晚歸，目睹著暨大一天天變化。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，暨大作為華僑大學受到史無前例的沖擊，經濟系的紅衛兵率先來到我家“破四舊”，父親成為“殘渣余孽”、“反動權威”遭到關押，母親因出身地主家庭被收繳了全部首飾，剛剛步入青年時代的我開始對暨大感到惶恐。記得一天深夜，暨大廣播站突然傳出劇響把我吵醒，原來學生造反派宣布奪了校黨委大權，接管了各系、各處室包括廣播站，接著口號聲、鞭炮聲、喊叫聲鋪天蓋地，弟妹們嚇得跑到母親房中。第二年，校園的兩派發生激烈武斗，校外武裝人員大批進駐暨大，校園開始瀰漫硝煙，嚇得母親帶我們兄妹搬到校外親戚家暫住。1968年實現“全國山河一片紅”，暨大成立“革命委員會”，“軍宣”“工宣”開進校園，母親和被關押的父親與全校教師干部一起，通通被趕到粵北英德茶場的“五七干校”。這年年底，我被學校分配到海南島上山下鄉，家中只有弟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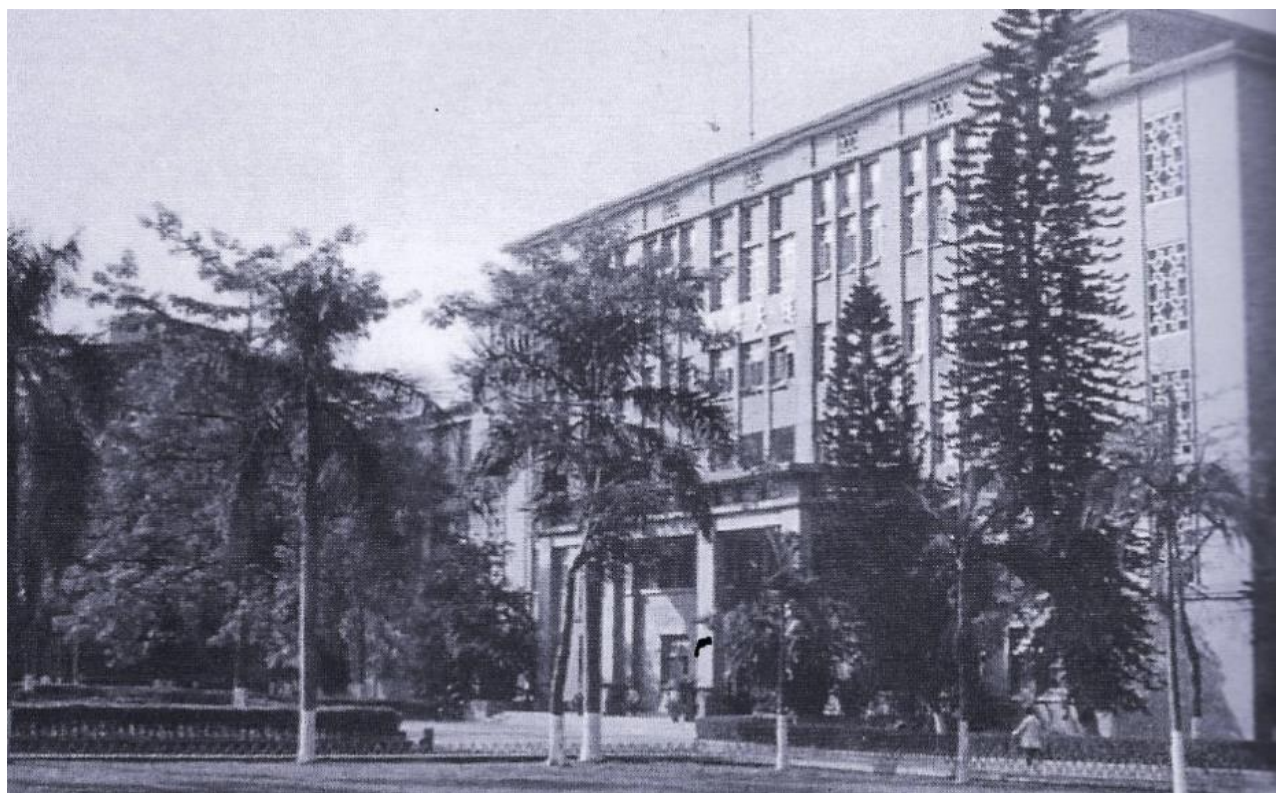
幫我收拾行裝。那時家中沒有電話，我跑到市區郵電局打長途與粵北幹校的父母告別，他們在電話中含淚要我保重身體，多給他們來信。不久暨南大學的建制被當局撤銷，校園由一家部隊院校接管。

我在海南當知青7年只獲準探過3次親，1971年我第一次探親時，父母仍在粵北的英德茶場干校，我要跑到那裡去和父母團聚。英德茶場原是廣東一家大型監獄勞改農場，文革前改成年滿釋放人員的就業之地，文革後又成為接收知青下鄉和干部下放的地方。看到父母和暨大的教授學者住在茶場的簡陋工棚里，進食粗糙的飯菜，與當地知青、民工進行同樣繁重的勞動，晚上還要開會學習，“接受工農兵再教育”，我的心破碎了。離別時父母送我上車，看見父母站在“暨南大學五七干校”門牌下揮手的身影，我對暨大的情感完全跌入深淵。那次我從海南農場來到粵北干校的探親情景，在我的知青生涯中留下極其痛苦的記憶。

### 站好高校講台 善待暨南學子

文革后內地大學復辦，大學教師落實政策返回校園。由于暨南大學的建制被撤銷，父母調入中山大學。1975年我從海南招工回穗，後來考入中山大學，畢業后留校任教，全家終在中大團聚。改革開放後，暨南大學得以恢復並在原址重新招生，父母奉命返回暨大任教，父親成為學術帶頭人和民主黨派負責人，當了系主任。為落實老知識分子政策，方便照顧年邁體弱的父親，1988年，當局把我從任職的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調入暨大港澳所，同年我在暨大經濟學院開講《香港經濟》課程。那年暨大推行學分制，學生可以跨院系修讀并累積學分，選讀該課程的學生很多，尤以港

澳生為最，每周排課很滿，大班的學生多達120人。面對開講新課和學生眾多的壓力，想起知青年代自己的苦澀大學夢，我對自己狠下決心，一定要站好暨大講臺，教好善待我的學生。



文革後暨南大學再次復辦時的教學大樓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內地出現“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”，港澳生聚集的暨大校園各種思想十分活躍，政治空氣開始緊張，剛走上講壇的我內心開始困惑。1989年“六四”前夕，內地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，暨大港澳生率先走上廣州街頭，發起全市大學生罷課，日趨嚴峻的局勢使我的心又一次徬徨起來。看見來上課的學生一天天減少，從文革、知青歲月走過來的我多次在課堂含淚苦勸，懇求同學們珍惜寶貴學業，不要上街遊行。無奈時局不饒，學潮難阻，我授課的大班學生最後只剩10人，但我仍然堅持未缺過一次課。“六四”之後，校方勒令參加遊行的學生要寫檢查，否則不准上課考試，嚴令各科主講教師執行。當時的局勢令暨大港澳生十分害怕，大都跑回港澳不敢回校。眼看學年考試在即，課程進入尾聲，各班還有大批港澳學生沒有回校，自己內心十分著急。我多次走進學生宿舍，打聽缺課學生下落，

懇求各班的內地同學相互勸告，希望港澳同學們早日返校，承諾會全力幫助他們度過現時難關。對後來陸續回校的缺課學生，我只字不提什麼要寫檢查，千方百計用課后時間為他們分批補習，把所缺的課程全部補上，讓凡修讀我課程的同學都能考試過關，拿到學分。事後有院系領導批評我“喪失政治立場”，坊間還傳出我“為學生考試放水”的非議。



筆者（前排右6）來港前與最後一屆任教的暨大畢業生合影

### 師生異鄉重逢 感慨人生港灣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獲批單程到香港定居，與居港多年的妻兒團聚，隨即加入香港媒體，任職報社財經記者，開始在多家港澳媒體撰寫專欄。記得有一次參加新聞界的新春酒會，當時的香港有線電視主播顧慧敏小姐到我面前，問我認不認識她，我一時納悶，靚女新聞主播，電視熒屏常見，僅此而已。此時她深情對我說：“張老師，我是暨大新聞系86級的學生，你上過我的課，專門幫我們補過習啊”，我聽后竟一時講不出話。幾天後，一批暨大新聞系畢業的香港同學在酒樓請我吃飯，面對一張張當年課堂上的熟悉臉龐，我的眼眶又一次充滿了淚花。看見當年教過的學生今天與自己成為香港新聞業的共事同仁，我深感世界怎麼會這麼小，暨大突然又變得那麼的溫馨親切，仿佛自己又回到久違的校園。



### 退休後筆者（右）常回暨大與舊同事回眸校園往事

今天，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暨大，腳步會特別沉重，思緒會更加復雜，今日的校園雖已高廈林立，但歲月的風云仍在我心中纏繞。我常想起陶鑄書記和各位暨大的老領導，常想起父母和院系的各位老前輩，想起新聞系顧慧敏同學和我教過的暨大學生，他們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出現，讓我看到歲月的無情與溫馨。啊，暨南園，我的生命小舟從你身邊駛出，今天又駛回你的身旁，我與你深情守望，總在你身邊徘徊，你是我生命小舟永遠停靠的港灣。

（作者是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長、香港書評家協會副會長、香港文化傳播協會副會長、港澳專欄作家）